

文旅融合背景下武夷山理学文化景观传承发展探究

严雨桐 樊启迪

武汉东湖学院, 中国·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文化景观作为一个新生概念,已正式列入世界遗产保护体系,它是一个内涵更丰富、维度更广的遗产范畴^[1]。理学文化景观是指历经时间的不断推演,在特定地域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独具特色、具有浓郁理学文化氛围的传统文化景观,是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2]。理学景观在历史推演下的空间演变是不可避免的,其发展过程与多种驱动因素存在密切联系。因此,通过对理学景观时空演变规律的研究对于挖掘理学景观内在价值并促使其在时代发展中焕发新的生命力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以下简称为风景区)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地,武夷山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夷山是朱子理学的摇篮,其理学景观留存数量较多,使武夷山成为闻名遐迩的理学文化名山^[3]。本文将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理学景观作为研究对象,剖析风景区在宋元明清这四个重要历史时期理学景观的空间分布格局和驱动因素,以揭示风景区理学景观发展的格局及其演变历程,以期对风景区理学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决策依据。

【关键词】理学;文化景观;文化遗产保护;武夷山

1 理学文化景观的研究现状

20世纪20年代,国外学者开始从事文化景观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在建筑和聚落文化景观研究^[4,5]、文化景观变迁^[6]、文化景观感知^[7,8]、文化景观规划^[9,10]和文化景观生态研究^[11]等方面。国内学者开展文化景观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地域性探索^[12]、乡村文化景观^[13]、文化景观遗产^[14]、保护的技术手段^[15]、旅游发展^[16]等方面。现有研究成果主要以定性分析、数理统计分析和静态分析为主,缺乏对文化景观进行定量化、动态化分析,且针对理学景观的研究较少,理学景观的时空分布特征及驱动因素相关研究较为薄弱。

宋朝以来,朱子理学在武夷山形成、发展,武夷山已成为理学文化名山。因此,武夷山荟萃了许多理学景观,如“道南理窟”、“朱子理学”、距今约3800年前插在悬崖上的船棺、宋代朱熹创办的紫阳书院、元代皇家茶园、历代摩崖石刻等,构成了武夷山重要的文化遗产^[17]。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文化景观分类的标准^[18],并结合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的地域文化特征,将风景区理学景观分为理学书院、摩崖石刻和宗教遗址3种类别。

2 理学文化景观的历史变迁及驱动因素

2.1 自然环境因素

理学景观在风景区内不同海拔高度上分布数量呈现出明显差异,海拔和高程能反映理学景观的布局差异^[19]。3类理学景观均在海拔200-300m数量达到峰值,且在海拔>600m处数量为0,说明理学景观整体分布在风景区低山丘陵地

带,这也与理学景观的核密度分析结果吻合。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是典型的丹霞地貌,地貌层次分明,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因此中国历代建成的理学景观大部分都位于风景区中部相对平坦的区域。由此可见,海拔高度是影响理学景观时空演变的关键自然因素之一。

2.2 政治制度因素

理学景观的时空分布格局与其时代背景和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由于各朝代统治年限不同,造成了理学景观在宋和明这两个统治相对长的朝代数量较多。统治者的政治目的和统治制度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化的走向。宋朝时理学文化开始盛行,很大程度是由于统治者将程朱理学作为官方统治思想,理学书院和宗教遗址等景观的构建达到了鼎盛阶段。而在元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替代了原先的汉族统治者,元朝统治者推崇本民族文化,使得原先正统的理学文化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因此该时期内理学景观的增设数量微乎其微。清朝时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的稳定,将程朱理学推为统治思想,直接为其政治制度服务^[20],因而清朝时也修建了较多的理学文化建筑,理学宗教遗址作为思想统治的阵地在清朝发展到了高潮。

2.3 经济发展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人们修建理学景观的能力,这无疑也直接影响着理学景观的时空格局。宋朝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黄金时代,海上贸易的开拓,加上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得以福建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得以迅速的发展^[21]

。所以宋朝统治者有足够的资本在武夷山地区大规模地建设理学建筑, 理学院和宗教寺院开始大量涌现。元朝经济则以农业发展为主, 生产力远不及宋朝, 致使武夷山理学景观在元朝建设的数量寥寥无几。到了明朝, 经济呈现出一度繁荣的景象,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开始农业经济结构调整, 给当时武夷山宗教建筑和书院景观的建造给予了经济上的支持。然而明朝中后期经济发展大滑坡, 国家财政陷入了绝境。因此明朝时建造武夷山理学景观的数量次之于宋朝。到了清朝, 经济发展快速, 但由于朝廷厉行海禁等经济政策, 严重抑制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导致清朝时武夷山理学景观建设的数量远远不及两宋时期。

2.4 文化内核因素

中国古代儒家以和为贵、佛家慈爱众生、道家天人合一和朱子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等也对风景区理学景观的诞生和演变产生了影响。一方面, 理学景观具有时间性, 各历史阶段打造出属于特定时代且能代表该时代的理学景观。南宋初年, 以朱熹思想为代表的理学在武夷山萌芽、发展和传播, 促使武夷山成为了全国理学文化的中心, 理学景观也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蓬勃发展。宋元时期, 武夷山的神仙道文化日趋成熟^[22], 致使武夷山的千岩万壑间留下了众多的文化遗存, 例如止止庵、天宝殿、开源堂等古宫观、道院等遗址。自明成祖赐大红袍以来, 武夷山也成为了备受追捧的静心养性之地, 所以寄托情怀与抱负的摩崖石刻在此时与日俱增。另一方面, 理学景观具有空间性, 即表现为地域文化特点。1400余年来, 儒释道三教在武夷山紧密融合, 因此书院、寺庙和道观毗邻而建, 加之传统文化的影响, 山中建筑多采用院落布局原则, 轴对称性明显。在朱熹的影响下, 历代理学家以传播理学文化为己任, 在武夷山峰下、九曲溪畔建立了书院, 留下了大量的理学文化遗产。到目前为止, 武夷山仍有许多与理学有关的书院、摩崖石刻和宗教遗址等。

3 理学文化景观的发展现状与传承建议

作为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丰富的理学景观和审美科研等综合价值吸引了无数游客纷至沓来。在旅游开发需求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近年来风景区内理学院、摩崖石刻和宗教遗址等文化遗产受到人为因素干扰显著增强, 景观的原始风貌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破坏。目前风景区严重风化的13方石刻中有8方待考察, 18座理学院中有10座因遭到人为破坏而完全废弃, 92座宗教遗址由于未受到充分的保护也有些亡佚或废弃, 这大幅度削减了风景区理学景观的总量, 严重影响了理学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2019年12月《武夷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及专项规划(2017-2025年)》发布, 政府和相关部门对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的发展规划制订了明确的目标, 高度重视武夷山的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23]。理学是武夷山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生命力, 风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应更加重视理学景观的保护工作, 大力弘扬理学景观的文化价值, 协调好旅游开发与文化传承的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 现提出以下提升建议:

(1) 凸显理学文化遗产的保护重点。首先, 风景区内宋朝建造的理学景观历时最悠久, 故遭受自然和人为的双重破坏最为严重, 故风景区应将宋代理学景观进行重点修缮和保护, 以促进宋代理学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其次, 桃源洞景区和九曲溪景区是理学文化遗产相对密集的区域, 也是游客活动集中的区域, 故这两大热门景区应被作为重点保护区; 再次, 位于低海拔范围的理学景观易于受到游客的毁坏, 因此应将低海拔范围的理学景观进行定期修缮与重点保护。

(2) 促进理学文化遗产的活化与再利用。首先对于历代理学景观, 应彰显景观风格的多样性, 并挖掘其传统功能。通过书院讲学、宗教朝拜等形式, 更多群众感受和体悟理学景观的文化底蕴; 其次, 通过旅游路线设计将热点景区的理学景观与非热点区域的理学景观串联整合起来, 最大程度发挥理学文化的辐射效应和社会影响力; 再次, 通过文创产品的开发, 打造理学文化IP, 服务于广大民众, 焕发理学文化遗产新活力^[24]。

(3) 加强理学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管理。通过融合自然文本、地图资料和GIS等现代信息技术, 构建风景区理学文化遗产地域信息化管理体系, 可直观展现区域理学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发展演变的历程和机制及其时空关系特征, 建立理学文化遗产的GIS数字化管理区, 致力于提高风景区理学文化遗产的规划管理与开发利用效率, 并促成理学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目的^[25]。

探索和研究理学景观时空演变的脉络和驱动因素, 不仅可以厘清风景区理学景观的空间分布格局, 而且可促使理学景观抖擞出新的生命力, 为推进该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对武夷山理学景观资源的定量分析是景观生态研究的创新点, 有利于为中国其他风景区或遗产地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26]。本文探研了风景区192处理学景观数量的时空演变和驱动因素, 而未关注各类理学景观的质量变化及其之间的关联。此外, 由于目前学术界对理学文化的界定尚不明确, 风景区内部分景观的归属不明, 有些亡佚或已废的景观资料仍有待考证, 本文仅研究

了3类理学景观, 风景区内其他文化景观资源, 如宅居、阁楼、墓地等未纳入研究范围。因此, 理学景观质量发展、景观之间的关联度以及更全面的理学景观资源的研究还有待更加深入。

参考文献:

- [1] 孙鹭, 张海峰, 王彬, 等. 国内外高原文化景观研究进展[J]. 地理研究, 2021, 40(5): 1280-1294.
- [2] 韩秋晨, 乌铁红, 王珏, 刘敏. 民族地区历史文化街区多元文化景观感知与景观认同研究——以呼和浩特市大召历史文化街区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2, 36(3): 195-201.
- [3] 陈支平, 冯其洪. 朱子学研究的现状分析[J]. 安徽史学, 2020, 4(1): 13-21.
- [4] 史祎雯, 朱喜钢, 孙洁, 等. 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OL]. 资源开发与市场: 1-12[2022-04-2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448.N.20220419.1617.002.html>.
- [5] JOHANSEN P G. Site maintenance practices and settlement social organization in Iron Age Karnataka, India: Inferring settlement places and landscape from surface distributions of ceramic assemblage attributes[J].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010, 29(4): 432-454.
- [6] BUZZELLI M. From Little Britain to Little Italy: an urban ethnic landscape study in Toronto[J].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01, 27(4): 573-587.
- [7] CALETRIO J. Tourism, landscape change and critical threshold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 38(1): 313-316.
- [8] SAUGERES L.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farming landscape: masculinity, power and natur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2, 18(4): 373-384.
- [9] RODIEK J E. Landscape planning: its contributions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profess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6, 76(1-4): 291-297.
- [10] VON H C. Landscape planning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landscape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2, 60(2): 73-80.
- [11] MAKHZOUMI J M. Landscape ecology as a foundation for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pplication in Malta[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0, 50(1-3): 167-177.
- [12] 李和平, 肖竞, 周晓宇. 西南盐业历史城镇文化景观构成与保护研究[J]. 城市规划, 2015, 39(7): 100-106.
- [13] 李玲斐. 乡村文化旅游景观设计中的地域文化分析[J]. 环境工程, 2021, 39(5): 277.
- [14] 卫伟, 陈蝶, 角媛梅. 加强梯田景观综合研究, 促进山地系统可持续发展——第十届全国景观生态学学术研讨会梯田景观专场述评[J]. 生态学报, 2021, 41(8): 3325-3329.
- [15] 王臣立, 徐丹, 林文鹏. 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遥感监测与土地覆盖变化[J]. 生态环境学报, 2021, 30(2): 233-241.
- [16] 云翊, 林浩文. 文化景观动态变化视角下的遗产村落保护再生途径[J]. 国际城市规划, 2021, 36(4): 91-98+107.
- [17] 陈支平, 冯其洪. 朱子学研究的现状分析[J]. 安徽史学, 2020, 4(1): 13-21.
- [18] 赵爱玉. 武夷山朱熹及其理学遗迹考[J]. 南方文物, 2007, 4(4): 179-180+149+201.
- [19] 游巍斌, 何东进, 黄德华, 等.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景观格局演变与驱动机制[J]. 山地学报, 2011, 29(6): 677-687.
- [20] 刘超. 民国历史教科书中的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以“清朝史”叙述为中心[J]. 学术月刊, 2014, 46(3): 148-158.
- [21] 代谦, 高雅婷. 刀锋上的商业革命: 要素禀赋效应与宋朝的海外贸易[J]. 经济学(季刊), 2019, 18(1): 235-252.
- [22] 邱宁卫. 武夷山宗教文化溯源[J]. 中国宗教, 2002, 8(4): 54-56.
- [23] 何思源, 苏杨. 武夷山试点经验及改进建议: 南方集体林区国家公园保护的困难和改革的出路[J]. 生物多样性, 2021, 29(3): 321-324.
- [24] 王芳, 黄远水, 吴必虎. 传统技艺文化遗产旅游活化路径的模型构建研究[J]. 旅游学刊, 2021, 36(2): 92-103.
- [25] 曹帅强, 邓运员. 基于景观基因“地域机制”的客家文化保护与传承开发——以湖南省炎陵县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7, 36(4): 164-170.
- [26] LU M, LUO X N, WANG Y H, et al. Ecological pattern of urban forest landscape of Ji'nan City, China[J]. Ying yong sheng tai xue bao = Th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019, 30(12): 4117-4126.